

民俗主义视角下的非遗保护

——以南京大山村庙会为个案

高鹏程¹

(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文化旅游学院, 江苏 无锡 214028)

摘要 | 民俗主义自上世纪被提出以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其内涵早已得到了扩充, 甚至某些方面也已发生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 国家权力与意识、商业化运作、大众传媒、文学艺术等多方力量的介入, 都令民俗主义的内涵不断变化着。这种变化与发展, 对我们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指导性意义。作为一项非遗, 南京高淳大山村三月十七庙会的顺利举办, 是由当地乡贤牵头, 联合管理部门、当地百姓、宗教人士等多方力量参与形成的文化合力所造就的。

关键词 | 民俗学; 民俗主义; 庙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桤溪镇大山村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高淳区。每年正月初十和三月十七, 当地都会举行为期三天的盛大庙会活动, 包括跳五猖、上香祈福、戏曲表演等, 吸引了包括当地村民及游客的广泛参与。大山寺地处大山村, 同时也是大山村庙会举办的主要空间和行动主体。庙会的成功举办, 除了令当地百姓获得了情感宣泄的渠道, 也成为桤溪镇国际慢城对外旅游的一张名片。本文以南京高淳大山村庙会为个案, 依据笔者于 2019 年 11 月两次前往大山村进行田野调查后所获得的资料, 从民俗主义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理解与分析, 认为大山村庙会之所以能够顺利举办, 是因为有当地乡贤的牵头, 并将管理部

门、当地百姓、宗教人士等多方力量卷入, 形成了一股推动非遗保护的文化合力。

一、民俗主义与非遗保护

民俗主义是民俗学研究中较早被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的一种学术概念, 最早由德国民俗学家汉斯 (Hans Moser)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及各国民俗学家的努力, 如今民俗主义概念的范围更加广泛、其内涵也变得更为深刻。

汉斯在 1962 年的文章《论当代的民俗主义》中认为, 民俗主义是一种使用民俗的现象,^[1]并认为它的存在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由传统上和功能上所

作者简介: 高鹏程,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文化旅游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民俗学、社会学史、教育社会学方向研究。

文章引用: 高鹏程. 民俗主义视角下的非遗保护——以南京大山村庙会为个案[J]. 澄启学刊, 2026, 1 (2): 57-62.

<https://doi.org/10.68070/q3536q97>

决定的民间文化的要素,在该文化的地域或阶层共同体之外进行的表演;第二种是指社会的另一阶层对于民间母题的嬉戏性模仿;第三种是指在任何传统之外对“类似民间的”要素的有意发明和创造。^[2]其实,民俗主义的概念并非汉斯首创,而是他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欧洲出现的一些零散概念基础上的理论整合,因此他的理论较为松散、难成体系,这也为后人对“民俗主义”理论的完善提供了上升空间。德国另一位学者鲍辛格为民俗主义概念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他试图对汉斯的理论进行完善、扩充与发展,认为民俗主义指的是那些引人注目的对民俗现象的运用和表达性的民俗表现,^[2]就是将过往的民俗运用在当下的世界,并将民俗当做一种商品而存在,与此同时,为了让民俗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必须要对其进行一定化地改造,民俗主义的现象便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了。

在两位学者之后,欧洲、美国、日本及中国等地的民俗学者都在不断完善、扩充着民俗主义的概念内涵,这也被当前民俗学者们视为民俗主义概念的滥觞。在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对民俗主义窄化、误读的现象,简单地理解为对民俗事象的应用与改造。^[3,4]2018 年,周星、王霄冰主编了《现代民俗学的事视野与方向》,共收录与民俗主义、本真性主题有关的文章三十四篇。来自包括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大陆等在内的学者们,在充分回顾梳理了民俗主义发展的脉络基础上,对民俗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民俗主义在各地的呈现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一方面,在对何为民俗主义的问题上,尽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民俗主义的理解和阐述有着各自的差异,但总体来看仍有共性。在导言中,周星、王霄冰对民俗主义作出了较为折中和妥帖的概念界定:

无数脱离了原先的母体、时空文脉和意义、功能的民俗或其碎片,得以在全新的社会状况之下和新的文化脉络之中被消费、展示、演出、利用,被重组、再编、混搭和自由组合,并因此具备了全新的意义、功能、目的以及价值。由此产生的民俗文化现象,便是民俗主义。

另一方面,尽管收录文章的主题和关注对象各有不同,但其内容或多或少地都讨论和回应了民俗主义和本真性的问题。在“民俗主义与本真性”专栏的简介中,编者亦阐述了本真性与民俗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民俗主义的概念及相关问题之所以能够在各国民俗学界均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它和民俗学的核心理念,亦即对于‘本真性’的追求密切相关。”本真性与民俗主义的概念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其实二者间的内在联系十分密切。^[5]

民俗现象的产生,必定依赖于一定的历史、地理、经济、人文等诸多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地理环境发生变迁,而民俗主义作为一种现象,就规定了其并非一成不变的特征。在民俗主义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意识、商业化运作、大众传媒、文学艺术等多方力量的介入,不仅加剧了这种变化的进程,更令民俗主义现象的出现变得更加普遍。

随着各级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以民俗事项及民俗活动为载体,行政权力与意识形态参与到当地文化发展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春节庙会的举办、参与公祭典礼、设立民歌比赛、认定非遗传承人等。有许多民俗活动因带有浓厚的民间信仰特征,曾经被视为封建迷信而被官方令行禁止。直到现在,许多曾被禁止的民俗活动得到解禁,要么因为有了官方的参与,要么因为获得了官方合法的认可。如张士闪在对于胶东院乔村谷雨祭的考察中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当地的谷雨祭海仪式被视作封建迷信,只能借助“军民一家亲”的名义向国家礼仪靠拢,才得以争取到一丝存续的空间;而 2008 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这项仪式才获得了来自国家层面的认可。^[6]可见,行政权力与意识形态的介入,对民俗主义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说权力话语决定着民俗主义的生死,那么通过商业化的运作,有了经济的助力,民俗主义的发展可以说获得了空前的生命力。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的七夕节,起源于远古时期的星宿崇拜,后来逐渐成为女性乞巧的节日。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玉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7]”传统的七夕节并没有任何美好爱情的寓意,但是商家却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进行包装,打造出属于中国的情人节,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随着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民俗主义的传播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与约束,央视《舌尖上的中国》《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纪录片获得了广泛好评,也使得世界各地的观众得以对其所呈现出的民俗事项有所了解。除此之外,文学与艺术中的民俗主义也颇为常见。如 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的开幕式晚会《印象西湖·最忆是杭州》,在半小时内,导演将能代表杭州的《梁祝》传说、断桥、明月、西湖、采茶女等元素通过声光电影的方式展现出来,将碎片化的民俗事项按照当下的需要进行整合与再创造。

在非遗保护中,民俗主义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积极地参与民俗事项的改造与转变,以便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符合市场的需要,获得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而另一方面,“文化原来是人们

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加工进行改良的结果。而一旦被认定为文化遗产，文化保护区的居民生活在特定时刻被‘冻结’，地域社会自律的发展由此遭到阻碍。^[8]千篇一律的老街古镇、形式单一的歌舞表演、一味商品化的民俗工艺，都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反面案例，让人们思考未来应该何去何从。

二、大山村庙会的历史与发展

大山村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桤溪镇，东临苏锡常，西接安徽，是“日出斗金、日落斗银”的江南鱼米之乡，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钦赐“江南圣地”之美誉。因其历史文化悠久，且地理位置距南京中心较远，受现代文化冲击较小，群山环抱，寺院林立，频繁的庙会和民间傩戏“跳五猖”（又称“出菩萨”），都是传统民间信俗在当地得到较好传承的体现。

大山头庙群地处于南京市高淳区桤溪镇大山村东北处，毗邻大山文峰塔和大山水库，因而又称大山寺庙群。作为南京西南地区民众敬仰的一处融合了佛、道和民间信仰的寺庙，其前身为大山祠山庙，始建于明朝末年，距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据记载，清光绪十三年（1887）由九华山大春法师主持兴建，后毁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现今的寺院占地 10 亩，建筑面积约 1200 平方米，现存的殿堂有大雄宝殿、三官殿、祠山殿、观音殿和综合楼，殿内分别供奉着三宝佛及十八罗汉、三官、祠山大帝、观世音菩萨和西方三圣等，因其依山傍水，地理位置优越，又与各村庄相距不远，因而常年香火兴旺，常住寺院僧人约 4、5 人。¹

据寺院大雄宝殿正门右侧所刻石碑记载，“大山头庙群始建何时已无从考证，原坐落于戏楼西南百余米处，明末清初迁至现址并加以重建，至光绪年间告一段落，原有房屋八十一间，分三殿：祠山大殿、十殿、三官殿；四堂：观音堂、监生堂、血池堂、华池堂。还有大小厢房、用膳房、接待室、僧人卧室、杂屋若干间。各殿各堂拱门相通，台阶连接，大殿门前有十九级青板石台阶，过三门到十殿四通八达，甬路皆以石板铺就，雨天不滴水，地上不沾泥，天井四座，植以异花奇木。庙群以祠山大帝，观音，关公为主佛像，庙内共有大小佛像二百余尊，其状严肃，栩栩如生，令人肃然起敬。鼎盛时期香客云集，晨钟暮鼓，诵经念佛之声不绝于耳，大山头顶峰文峰塔绕角铃声悠扬于四乡八邻，是众生敬佛了愿之地”。

与传统的汉传寺院不同的是，大山寺毗邻的文峰塔并非佛教宝塔，而是为了振兴当地文风，祈求

国运昌隆的风水宝塔。与宝塔有关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民国高淳县志》“文峰塔县东六十里大山头光绪十三年张桂林倡建”^[9]的记载。而根据夏孝栋所编著的《桤溪传闻轶事》传说：大山寺主持大春和尚发动乡邻建成七级宝塔一座，苦无命名困难。因当时曾被明惠帝朱允文任命为兵部尚书的高淳人齐泰被朱棣杀害，他的家人和一批文人学士受株连，或被杀、或充军。因此百姓们对读书做官十分畏惧，不让自己的子女就读，更不与书香门第联姻。《江宁府志》记载：自齐泰死后的 200 年间，高淳民间不闻读书之声，邑民中举者甚少。为了唤醒民众，振兴高淳重文之风，经大众商议而取名为“文峰塔”。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为避免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而不得不拆毁宝塔，以保护乡民安全。如今的文峰塔落成于 2012 年 10 月，成为地标性建筑及景观，可起兴文运、振文风、保地方平安、造万世太平之效。

大山寺每年春天会举办两场庙会，时间分别为农历正月初十和三月十七日。正月初十举办的庙会规模较小，参与人员仅限于大山村及附近村民，属于当地特有的一种春节习俗。正月初十当天，高淳附近溧水、仙台的百姓会组织盛大的“跳五猖”队伍，跟着祈福的信众，他们身背香袋，手持点燃的长香，一路敲锣打鼓，翻山越岭至大山寺的祠山殿礼拜祠山大帝，以祈求新的一年家宅平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跳五猖又称五猖会、出菩萨，为古代傩舞之流变，传说朱元璋称帝后，为感激祠山大帝在占卜中预言他将来会得天下，便下旨广德兴建 360 座寺院以供奉祭祀祠山大帝，并将五猖神作为开道神将敕赐给祠山大帝，因而在江南一带，凡遇祠山庙，必然会供奉五猖神。皇家政治力量的介入，令五猖神信仰代代传承、兴旺发达，明朝丘潜《大学衍义补》中记载明代皇家祭祀中有“陈前、陈后神祇，五猖等众^[10]”之说。跳五猖整套仪式古朴庄重，神秘莫测，五位壮汉分别为身着红、蓝、黄、黑、白色铠甲，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五方天帝，暗合木、火、金、水、土五行之色；另有四名表演者穿着各自所扮演角色的服装，手拿纸扇、拂尘、蒲扇、纸马，分别代表着道士、土地爷、和尚、判官等 4 位为民请命的“地神”。扮演五猖的壮汉脸戴面具，扮演和尚的则戴着木质头套，身披铠甲、肩插金翎、手持双刀，身后随从手持伞盖，为他们遮风挡雨。整场跳五猖仪式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是巫、傩、道、释多元思想的表达，同时也是当地民间信俗仪式中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

大山寺法师指出，“正月初十的庙会其他地方信众前来上香，我们庙里本身并不组织，而且搞‘出菩萨’的活动都要年轻的小伙子，不然几十

1 访谈对象：某法师，男；访谈人：高鹏程，访谈时间：2019 年 11 月 16 日；访谈地点：大山村大山寺。

斤的东西要扛在肩上，又要爬山过来受不了的。办一次也要花个几十万，要有大老板的赞助，不然办不起的。我们庙里还要给他们红包，就像儿子过年给老子拜年一样，不给不好的，大家热闹热闹”²。由此可见，正月初十的庙会是以朝拜大山寺祠山大帝为主，寺院本身也并未参与组织，而仅作为一种参与者，开放寺院的大门，为香客们提供一些祈福必备的香烛纸马。法师还告诉我们，因为初十的庙会没有当地老人协会的介入，因而在大山村本地的认可度也不是很高。虽然初十庙会的观众仍然很多，但当地的民众只是将这种庙会当成一种娱乐活动，而非亲身参与其中的精神寄托。

只有三月十七举办的庙会，才能够充分调动民众们参与其中的热情，也能够发动起各方力量参与庙会的举办。三月十七的庙会将会持续三天，直到三月十九日圆满结束。在持续三天的庙会中，十八日当天是当地人所谓的“正日子”，也是庙会活动达到高潮的日子。期间，大山寺内铙声、鞭炮声、鼓乐声响彻云天，人们不仅燃放鞭焚烧高香，而且会摆设各种祭品予以祭祀，以求祠山大帝保佑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根据访谈内容，令当地百姓及寺院方面感到困惑的是，他们其实并不清楚为何庙会的日子会被定在三月十八，因为当天并不是祠山大帝的生日或成道日，也并无其他需要纪念的名人或事件。据当地法师所说，“大山村庙会的日子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但在大山村不远处有一座祠山大帝的纪念馆，他们每年会在农历的三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进行庆祝活动，有可能是各村为了庙会日子的冲突特意避开的”³。

在农历三月的庙会期间，除了会举行跳五猖仪式，大山寺也会大开山门接待络绎不绝的进香信众，当地老人协会还会牵头，邀请各地戏班连唱三天戏，让祠山大帝得以欣赏，以庇佑一方平安。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发源地之一，高淳地区的戏曲传统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当地人有“出门山歌进门戏”[11]的俗语，体现出了高淳人对于戏曲的喜爱。被称为“百戏之祖”的目连戏至今也有 700 多年的历史，因而数百年来，高淳地区的戏台遍布乡间田野。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截止 1958 年，高淳地区共有古戏台 28 处。^[12]

在大山寺大雄宝殿的正南方，有一座属于江南三大戏台的“天地大戏台”，江浙一带著名的春福班曾在此登台演出。戏台与大雄宝殿之间的观众席是一块山谷洼地，形如巨型簸箕，其坡面向北逐渐

升高，看戏的人既可以席地而坐，也可以趟倒在山坡上，据载最多可容纳六万人同时看戏，故又称天地大戏场。⁴对于庙会期间所演出的剧种曲目也并无特殊规定，而是根据戏班演出水平的高低来决定，寺院恢复的十几年间，曾有锡剧、扬剧、淮剧、黄梅戏、越剧等多个不同的戏班登台演唱。

据当地人所说，请戏班唱戏并非是为了让赶庙会的人开心，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祠山菩萨看”，即起到一种娱神的作用。祠山菩萨即是民间所谓祠山大帝，同时也是大山寺供奉的主要神祇。据说祠山大帝是一位治水功臣，姓张，名渤，字伯奇，生于西汉年间。张渤幼年受大禹治水的影响，立志献身于祖国的水利事业。当时，我国江南一带水系不畅，为了治水，变卖家产，在各地开河筑坝，疏浚水道，引入海水，年老后隐居安徽广德横山，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死后葬于广德祠山岗，祠山一说，由此得名。

张渤死后，各地民众念其劳苦功高，将其奉为神灵，纷纷建祠立庙，塑其神像，年年祭祀。上海建有“张大帝庙”，无锡有“张元庙”，南京有“祠山广惠王庙”，广德有“祠山庙”等。历代帝君对他均有封赠，唐朝敕封他为水部员外郎，后来又被敕封为威德圣烈王，辅顺真君，明朝敕封他为祠山大帝，民间则尊称他为祠山菩萨。⁵

三、庙会举办中的老人协会

大山寺作为庙会主要举办的场所，在一年期间的两次庙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在正月初十的庙会中，大山村仅仅是活动的配合者，只需要在进香队伍到达时，开放寺院的山门，为进香的信众预备好香烛纸马即可。有时进香的队伍会给寺院一些“红包”，寺里的居士说：“因为这个地方的祠山大帝有威望，影响力大，所以他们要来进香，来拜年，这个红包就像是晚辈给长辈的礼物一样”。虽然寺院对此较为积极，但因为其规模较小，人员涉及也仅仅是外村人，当地民众的参与程度不高，因此大家对本次庙会也不太热情；而在农历三月十七的庙会中，寺院会积极地与当地老人协会进行沟通协调，成为推动庙会举办的一支重要力量，因为寺院不仅可以在庙会中获得较多的香火钱，而且还可以通过庙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促进寺院未来的发展。

在田野调研的过程中，据当地法师透露，农历三月十七庙会的举办，寺院并不是牵头的力量，仅仅只是参与其中，并服从当地老人协会的安排，因为寺院里面不仅人手不够，资金方面更是有巨大的

2 访谈对象：大山寺常住居士，男；访谈人：高鹏程，访谈时间：2019 年 11 月 16 日；访谈地点：大山村大山寺

3 访谈对象：某法师，男；访谈人：高鹏程，访谈时间：2019 年 11 月 16 日；访谈地点：大山村大山寺

4 据大山寺戏台前竖立的介绍牌文字删减

5 据大山寺祠山殿祠山大帝介绍删改整理

缺口,因此,举办庙会便成为了当地老人协会的任务。由他们牵头,不仅热情地出钱出力,还积极地鼓励村民们捐款出力,与管理部门进行安全等方面的沟通,并负责收取赞助方的供养金,及时地对外公布收支情况,成为联动寺院、村民、当地管理部门和赞助方的纽带和中坚力量。

老人协会是由当地年纪较长且有威望的老人所组织起来的乡贤团体,是庙会能否成功举办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季中扬教授所言,乡贤作为当今中国乡村中的“民间权威”,其权力的获得与运作固然离不开国家力量,同时也需要扎根于“文化网络”。他认为,“所谓‘文化网络’,主要是指当代乡村社会中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尤其是组织民俗,如‘巷道’组织、社火组织、庙会组织、‘三十年’、‘讲茶会’等。在当代,一些‘文化网络’保存良好的传统村落,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成效往往较为突出”^[13]。而属于大山村“文化网络”的农历三月十七庙会,为老人协会展现其参与地方治理能力提供了平台,历年来庙会的成功举办,又促进了当地百姓对老人协会积极作用的肯定,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圈。

根据在大山村及其他村落所获得的调查访谈资料,当地的老人协会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长期存在的、主要管理本村事务的老人协会,主要负责婚丧嫁娶的操办、村中安全的维护、邻里矛盾的调解等,其成员选择的首要条件必须是本村人,如果是外村人则是不合适的。因为大山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是依靠乡村旅游产业,因而在社会治安、质量要求方面需求较高。老人协会一方面对村委会所制定的乡规民约进行宣传贯彻,另一方面也对文字化规定所未涉及到的方面进行有效地补充与完善。协会中框架完整,层级分明,分工明确,为大山村的日常运作做出了贡献。

另一种老人协会则是临时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举办好三月十七的大山村庙会。因庙会辐射的范围较大,故而临时老人协会由附近十几个村落各自推选出的代表组成,其选拔标准也是“年纪肯定要大,在村子里面有威望,而且还要有钱有精力来搞的,主要是村子里面的一些老同志。”⁶大山村推选出的代表,就是本村长期存在的老人协会中的核心人物。临时性老人协会的活动时间,仅仅只有庙会前后十几天的时间,据村民所言,“整个庙会要搞半个月左右,之前要先确定邀请名单,再给人家一个个发请帖,还要请了以后吃酒,大摆宴席,请来的人还要给他们发发红包,实在是费精力。我自己也曾经搞过十年,现在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弄

了。”⁷由此可见,只有在三月十七庙会的前后半个月时间里,这支由各村耆老组织起来的老人协会才会发挥作用,其所管辖事务的范围也仅仅与庙会活动相关,且不对其他事务进行干涉,他们只是负责在村民中募集善款或物资,联系赞助商出钱,帮助寺院完成提出的要求,联系庙会中唱戏的戏班等,但要想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完成这么多任务,临时老人协会的活动时间仅仅如此短暂吗?

在大山寺大雄宝殿外墙四周,共有十几块嵌入墙壁内的黑色石碑,分别是《大山头庙群重建功德碑》《大山头庙群简况》石碑及历年为农历三月十八唱戏捐款名单的石碑。根据当地法师介绍,“1998年,大山寺由周边十三村老人代表发起募捐,重建大雄宝殿、祠山大殿、天地戏台、观音殿、十王殿,三官殿等。”⁸但根据大雄宝殿正门左侧的《大山头庙群简况》石碑记载:

战乱时期庙群命运乖舛,毁于一旦,方今国运昌盛,民生康乐,重建大山头庙群乃民心所向,(此处为四人姓名,故略去)赤心萌发,急足先登动员十三村有识老人于二〇〇三年仲月十二日在芮先声家商讨重建大山头庙群一事,并组建庙会成员,由(此处为五十一人姓名,故略去)为庙会成员,分工明细,各项负责,立即筹建,做工不计酬,吃喝掏腰包,风雨无阻,非常时期不停止,求捐不停顿,赖香客之功,依信士之意,借百匠之艺,一年初具规模,以现昔日高庙之盛况,酬乡民燃香拜佛之心愿。公元二〇〇五年三月。

可知最早在 1998 年,当地负责举办庙会的老人协会就发起了重建庙宇的筹款。“现在大雄宝殿及内部所塑的三宝贝、十八罗汉,两侧的十殿阎罗塑像,都是当地的老人协会他们牵头搞好的,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就已经弄好了。”⁹在 2011 年 1 月,大山寺庙群经南京高淳区人民政府批准为佛教活动场所,并恭请法师驻寺恢复重建,而在此之前,大山寺并非一个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根据笔者在大山寺的调研,在那时,这支老人协会是将其作为一种劝人向善的教育场所,以期民风淳朴、人心向善。

四、余论

民俗主义在上世纪 60 年代被提出时,因其理论复杂庞大、缺乏体系而受到批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国民俗学者对民俗主义的概念有了基本共识:凡是涉及到对于民俗学及民俗事项的使用、创新、商业化的,都可以被纳入到民俗主义的框架中来。

6 访谈对象:大山村零售店老板,男,65岁;访谈人:高鹏程,访谈时间:2019年11月16日;访谈地点:大山村

7 访谈对象:大山村零售店老板,男,65岁;访谈人:高鹏程,访谈时间:2019年11月16日;访谈地点:大山村

8 根据大山寺法师所提供大山寺简介所删改

9 访谈对象:大山村零售店老板,男,65岁;访谈人:高鹏程,访谈时间:2019年11月16日;访谈地点:大山村

如果从 2001 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算起,如今中国的非遗已经走过了 25 个春秋,从发轫时的大范围申请非遗转变为对申请非遗的传承与保护,中国已经步入了“后非遗时代”。这也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关于非遗的传承、教育和传播等多方面的问题,继而关注到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中的不足。^[14]

如何在对非遗进行开发利用与合理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并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推动机制,民俗主义或许可以提供恰当的解决方案。在高淳大山村,农历三月十七的庙会是当地非遗展示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各方力量的联动参与,促进了庙会的顺利举办与发展。一方面,庙会作为当地原住民的精神寄托所在,当地老人协会、寺院僧俗、捐款老板等积极地为庙会举办出钱出力,成为庙会举办的重要内因;在另一方面,大山村因地处旅游景区,举办时间又是游客较多的春季,故被景区作为一处特色旅游点对外宣传,成为大山村庙会顺利举办的外在原因。

参考文献

- [1] BENDIX R.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M].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7.
- [2] 杨利慧. “民俗主义”概念的涵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义[J]. 民间文化论坛, 2007(1): 50-54.
- [3] 高鹏程. 民俗主义视角下的南京大福村七仙女传说[J]. 节日研究, 2020(2): 254-265.
- [4] 韦文焕, 陈钰文. 民俗主义视域下的毛南族分龙节考察[J]. 河池学院学报, 2021(1): 32-36.
- [5] 周星, 王霄冰主编. 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 民俗主义·本真性·公共民俗学·日常生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6] 张士闪. “借礼行俗”与“以俗入礼”: 胶东院村谷雨祭海节考察[J]. 开放时代, 2019(6): 148-165.
- [7] 宗懔. 荆楚岁时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56-59.
- [8] 西村真志叶, 岳永逸. 民俗学主义的兴起、普及以及影响[J]. 民间文化论坛, 2004(6): 70-75.
- [9] 刘春堂, 吴寿宽. 高淳县志[M]. 民国七年刻本: 398.
- [10] 丘濬. 大学衍义补[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463.
- [11] 郑旻昱. 高淳傩舞“桤溪跳五猖”研究[D]. 南京: 东南大学, 2015.
- [12] 姚明霞. 高淳县文化旅游资源评价与利用研究[D].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 2010.
- [13] 季中扬.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民俗文化资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9(2): 89-94.
- [14] 高小康. 走向“后申遗时期”的传统文化保护[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2(2): 39-46.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afeguar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ism

—— A Case Study of the Dashan Village Temple Fair in Nanjing

Gao Pengcheng¹

(1. Schoo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Wuxi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xi Jiangsu 214028)

Abstract: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 the last century, folklorism has undergone decades of development, during which its connotation has been substantially expanded and even transformed in certain aspect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involvement of multiple forces—including state power and ideology, commercial operations, mass media, literature and the arts—has continuously reshaped the meaning of folklorism. Thes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carry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As an ICH item, the successful holding of the March 17th Temple Fair in Dashan Village, Gaochun, Nanjing,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cultural synergy generated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local elite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local residents, religious figur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Keywords: folklore studies; folklorism; temple fai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